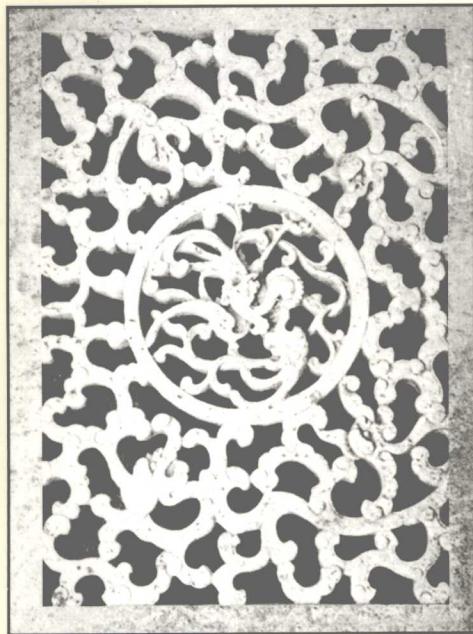


宁波慈城冯氏研究

NingBo CiCheng FengShi YanJiu

(冯骥才卷)

2006年10月



【宁波市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宁波市慈城冯氏研究会】

卷首语

杨复源

宁波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慈城是这座名城中的明珠。

慈城地处宁波江北区，是个有着7000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建城史、2200年的建县史、1200年的县城史的古镇。千百年来一直是浙东重镇，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慈城还是一座儒城，它崇师尚学、以文兴城，是孕育浙东文化、商业人才的摇篮，素有“儒学重镇”、“进士故里”的美誉。在这块土地上，古代先后出过5名状元、1名榜眼、3名探花和500多位进士，近代又涌现了京剧大师周信芳，中科院院士谈家桢、朱祖祥、颜鸣皋，金融家秦润卿，实业家应昌祺，书法家梅调鼎……他们都是宁波名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更以他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遐迩。近些年，他将书桌搬到田野，置身于民间民俗文化保护的“战役”，以“文化人”的身份和姿态关注文化命运，呼吁文化良知，从而誉满海内外。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卓祥驥说过：“冯骥才主席是宁波的骄子，他属于宁波，更属于全国，甚至全世界。”

自2001年以来，宁波市做出了挖掘慈城千年文化底蕴、塑造宁波城市文化品格，彰显宁波城市个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了慈城的保护开发建设。通过几年的努力，“江南第一古县城”的慈城已渐显“儒魂商魄”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为了更好地推动慈城的保护开发工作，把宁波的“文化大市”和江北的“文化大区”建设落到实处，我们先后开展了“外滩文化”、“慈城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系列研究，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宁波慈城冯氏（冯骥才）研究》便是系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名人文化和望族文化为切入点，专题研究冯骥才的文艺作品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和文化思想，专题研究慈城冯氏的历史渊源和家族魅力。希望它能为慈城保护开发和宁波江北城市的文化塑造提供有益的帮助。

2002年，组织上安排我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北区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走近冯氏家族。在与慈城冯氏家族的接触中，尤其是在与冯骥才主席的接触中，我深为他的民族情怀、文化情怀、故乡情怀所感动，也深为江北区有冯骥才这样的文化名人而自豪。我们在编辑《宁波慈城冯氏（冯骥才）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2006年9月28日

目录 CONTENTS

会悟解读

- 04 文化良知·文化命运·文化实践 / 南志刚
- 09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 刘华
- 14 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 / 江胜信

倾诉交流

- 19 与巨人握手 与大师对话 / 蔡启军
- 21 天籁 / 王静
- 22 思想，是不能忘记的 / 张存
- 23 平凡人物 不凡光彩 / 赵跃年

笔墨情思

- 25 太阳礼赞 / 冯骥才
- 28 乡魂 / 冯骥才
- 30 天一阁观画观 / 冯骥才
- 31 笔下宁波人 / 冯骥才
- 32 祖居感怀 / 冯骥才

本刊有关冯骥才资料由
天津市大树画馆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冯骥才工作室提供

奇志异行

- 33 十年之忆 / 樊夫
- 38 我与大冯的一段交往 / 贺圣思
- 39 在大树画馆作客 / 王芳
- 40 土厚根深 人远情长 / 陈强峰
- 43 点点滴滴故乡情 / 王静

悠远家世

- 46 千年望族 / 王静
- 52 慈城冯氏与近代宁波社会事业 / 孙善根
- 56 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 / 童银舫
- 59 慈溪冯氏族史简考 / 钱文华

斐然成果

- 60 冯骥才举办过的个人画展
- 61 冯骥才文学及绘画作品目录
- 66 冯骥才年略表

美术欣赏

- 封面** 石窗
- 封二** 国画《故乡》
- 封三** 冯骥才书画作品选
- 封底** 慈湖

宁波慈城冯氏研究

(冯骥才卷)

2006年10月

宁波慈城冯氏研究

NingBo CiCheng FengShi YanJiu

(冯骥才卷)

2006年10月



【宁波市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宁波市慈城冯氏研究会】

主办 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慈城冯氏研究会

编委会主任 杨馥源

编委会副主任 孔宇 陈屹华

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孔宇	王振	王静
杨馥源	陈屹华	南志刚
顾晓霞	钱文华	裴明海
戴松岳		

主编 孔宇

责任编辑 王静

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61弄
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电话 0574-87665961
传真 0574-87669891
邮政编码 315020
电子信箱 newjb@vip.sina.com
印刷 宁波正平印务有限公司

文化良知·文化命运·文化实践

——全球化语境下冯骥才的文化批评

南志刚

摘要：冯骥才的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化批评的代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剖析冯骥才文化批评的内涵：以“文化人”的身份和姿态，呼唤文化良知，关注文化命运，守望民间文化，并提出实践性品格是冯骥才文化批评的最大亮点。期望文化学者走出书斋、积极参与“抢救与普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

关键词：冯骥才 文化批评 文化实践

全球化的冲击，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保护、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成为严峻社会课题。近年来，冯骥才以“文化人”的身份和姿态，深刻思考“地球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呼唤文化人的“文化良知”，关注急速现代化和商业浪潮中文化的命运，为抢救和普查中国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表现出强力的文化责任感、具有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的文化眼光和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成为当前文化批评既亮丽又颇具悲壮色彩的风景。

一、呼唤文化良知

呼唤文化良知，重建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担当意识，是冯骥才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有人曾问过冯骥才：喜欢作家还是知识分子？冯骥才回答说：我

更喜欢另一个概念：文化人。“文化人”是冯骥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这一定位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冯骥才是执著的。“文化人”不同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也许“作家”在现代社会中太职业化，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外来的词语，又太抽象，有太多的书斋气息。冯骥才把自己定位在“文化人”的范畴，因为他的文化批评已经远远超出了某一特定的文化职业，而关注在全球化的商业市场浪潮和急速现代化过程中整个文化的命运，尤其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命运；同时，冯骥才的文化批评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大相径庭。在“文化人”的定位中，包含着冯骥才对本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包含着冯骥才对文化现状的不解和反思，包含着冯骥才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和殷切期望，体现出冯骥才

的文化精神、文化眼光和文化立场。

文化责任感，是文化人身份的标志，是文化人实现其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重要保障。自古以来，文化责任感把文化人与社会、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文化责任感，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一种文化责任感，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是一种文化责任感，李大钊的“铁臂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一种文化责任感，鲁迅赞赏“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一种文化责任感。文化责任感是文化人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意识，是文化人应该具备的社会良心，也就是文化良心。作为一个文化人，如果失去了文化良心，失去了文化责任感，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的必要性，就此而言，文化责任感实际上是文

化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是，曾几何时，责任感一词为当今的文化界所厌倦，似乎，“责任感”成为捆绑作家创作自由、扼制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外加束缚。逃避文化责任感，导致文化人的人文精神失落，多少文化人在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乌托邦”中“得道成仙”，文学和艺术一头扎进“市场”的浪潮中。一方面，城市建设片面追求现代化，造成无法挽回的“建设性破坏”，清一色的高楼大厦不断扩张，迅速淹没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一方面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通过各种文化市场大量流失到国外……大规模的文化建设生产出大量的文化沙漠。

冯骥才痛切地感到：“我们的民间文化博大而灿烂，但挡不住现代的狂潮，正在急剧地瓦解、消散、流失。”（《从潘家园看民间文化的流失》）通过对潘家园市场发展的描述，冯骥才告诉我们：每个城市都有的古玩市场，就是我们民间文化正在流失的窗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宝、文物大量外流，有些是被列强抢而去，有的是被蒙骗而去……多年来，我们为了寻回我们自己的文物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海外华人呕心沥血，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在“潘家园”，我们的民间文化遗存正以市场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当老奶奶的梳妆盒被卖光，当古老家具上的雕花被卖光的时候，最后能够出卖的就只有我们自己，然而，连自己祖先的遗产都敢变卖一空的“败家子”，有谁还敢买？“民间文化一旦离开它的本土，便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而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了历史的根脉与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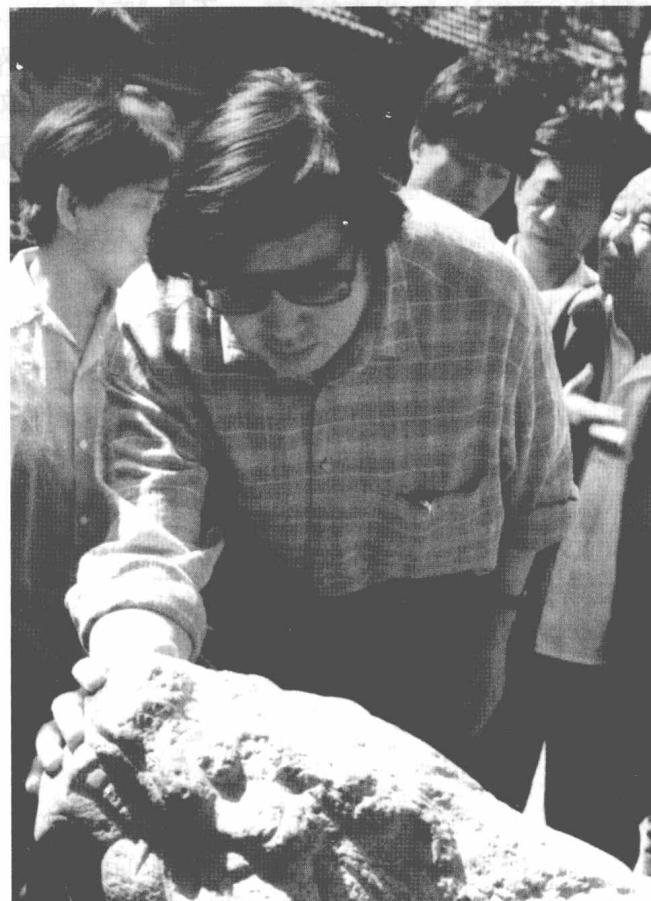
冯骥才痛心地看到：在大规模

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一个个“现代化”城市的迅速崛起，西方近现代城市文化模式不断地挤压中国城市文化的生存空间，一座座承载民族文化内容的城市建筑物被推倒拆迁，代之而起是钢筋混凝土支撑的高楼大厦，城市改建新建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抹平我们一息尚存的城市记忆。短短20年间，“建设性破坏”席卷中国，“功能主义”的粗鄙文化在城市建设中肆虐，在日新月异的变迁中，我们割断城市文化的整体性，自残城市文化的个性。20年来中国最霸道的一个字：拆！不仅表现出无限权威的霸道，更折射出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哀痛。冯骥才连篇累牍地质疑现代城市改造运动，告诫人们：“城市与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坎坷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他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他大声疾呼：手下留情！

冯骥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在一条历史的分界线上。在我们的前面是“全球化”文化，在我们背后是各自民族

和地域的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始于一个个人文聚落的源头，并在相互隔绝中成长与形成。所以，每一种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都是一种“异性”，相互不能替代。文化的最高价值曾经被确定为独特性。可是当我们从这种文化的历史迈向未来，也就是迈向全球化之后，必然丢掉的便是这种地域的独特性。可以说，我们正面临这样一场文化上的自我毁灭。（《谁在全球化中迷失》）

正基于此，冯骥才更认同“文化人”，这种认同就是呼唤社会良心，就是呼唤文化良心，当今中国“多么迫切地需要多一些虔诚又火热的文化良心”！面对某些人对文化责任感的厌倦和质疑，冯骥才愤然写道：“责任感就是社会承担。



每闻新的出土，随即拍马赶到

你有权利放弃这种承担，但没有权利指责责任——这种自愿和慨然担当的社会道义。为了强调这种文化责任，我更愿称之为文化良心。”呼唤文化人关注文化责任感，重建文化人的人文精神，不仅是文化人自身的需要，更是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必然要求。

读冯骥才的文化批评，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幅著名的现代画《呐喊》：一个人站在连接着两个时代的桥上，面部肌肉变形，对着我们呐喊。冯骥才正处于这座桥上，也许，他的表情并不优美，也许他的声音并不动听，也许他暂时还显得形单影孤，然而，他的声音绝对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如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结束时的钟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拷问我们的精神！

二、关注文化命运

关注文化命运，是冯骥才的文化眼光。只有具有高瞻远瞩的现代文化的眼光，保持清醒的文化立场，才能在当今世界纷杂烦乱的文化事项中，理清头绪，从而进行文化批评和文化建设。

“正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关注畸形社会中种种小人物的命运一样，进入90年代后，我特别关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文化责任感》)关注文化的命运，首先应该具备文化眼光，因为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只有具有文化的眼光，才能正确地估价文化的价值，“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生活的一切，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实和深邃”。(《文化眼光》)怎样养成文化的眼光呢？冯骥才认为：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的眼光，它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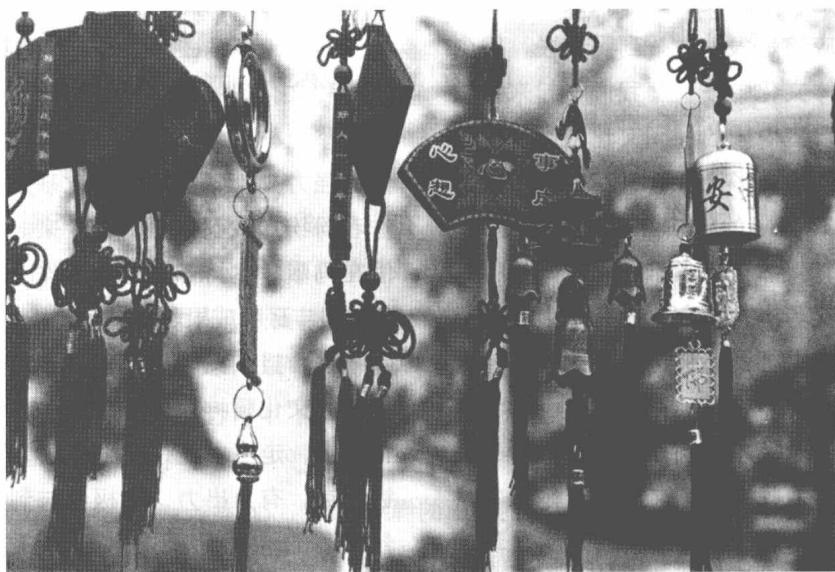
养，必须具有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因为：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

冯骥才带着这种文化眼光，带着这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来看待我们现在的生活，因而，他能够发现我们生活中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事项。长期以来，冯骥才关于春节文化的呼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在《谁消解了我们的文化？》、《年文化》、《春节晚会是跛足的新民俗》、《年，不能再淡化了》、《禁炮不如限炮》、《魂兮归来，年画！》等一系列文章中，冯骥才大力挖掘春节的民俗文化内涵，认为“年”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联结的一种方式，不是“吃”的文化，更不能用假日文化、商业文化取而代之，他针对当时许多城市禁放鞭炮的做法，提出现实性对策，而且从文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建设年文化，便是一个太大的、有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把年文化当作连结中华民族情感和精神的纽带来建设，表现出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正是带着这种文化眼光，冯骥才对“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进行摸底，进行清理。通过冯骥才的分析，我们看到当代大众文化最大的“供应商”：报纸、电视和网络，这些媒体为大众提供的看家菜是名人文化和时尚文化，因而当代大众文化菜单“基本上是快餐式的、消费性的、粗鄙化的，而且带着很大的商品的制作性……精神里没有多少真正的东西。”(《当代大众文化菜单》)这样的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又借助着商业快餐

文化的媚俗手段，迅速占领了文化市场，不断浸染着当今的青少年，不断抢占、挤压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怎能不令人忧虑焦急？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文化眼光、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能够着眼于未来看待文化、估价文化的价值，因而，冯骥才对伪文化也特别敏感，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洞察力，总能在常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项中，发现文化问题。当唐装与中国结风靡一时的时候，冯骥才敏锐地看到这两种“出口转内销”的中国文化符号的流行，“不能不说，至今我们还不善于从文化角度对待自己的传统，也不善于从文化角度来看待生活的一切”，“为什么我们守着那么博大深厚的民族和民间文化，却不能推出几个更具魅力、更迷人、更隽永的文化符号来？”正当全国各地为了招徕游客，不断“挖掘”地域旅游资源，大规模从事旅游景点建设之时，冯骥才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仿造的“伪文化在当今中国，可谓铺天盖地，波澜壮阔，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的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学名著，都演化成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如‘西游记宫’、‘封神榜宫’、‘水浒宫’等等；小到各种工艺品名，大到亭台楼阁，城池要塞，直到开封那条仿造古代的大街。”(《伪文化之害》)这些伪文化既没有历史知识性的精心设计，更没有经过真正文化专家们的充分论证，一切以实用目的为出发点，对历史横加改造、肆意践踏，当然就谈不上历史感和美感了，其结果只能形成粗鄙的仿古文化，进一步导致民族低素质化。冯骥才感觉到长江工程可能的灾难，随着三峡大坝



中国结成了当今一种本土文化挣扎的符号

的筑成，整条长江将进入一个旅游开发的热潮，他担心“我们将这样地‘创造’神州大地上最大的人文景观，也是一种现代人文、粗鄙的！浅露的！娱乐化的！商业化的！我们将把一条具有七千年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改变为一条浅薄的、庸俗的、旅游化的长江”。冯骥才提醒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长江文化的保护利用要进行专题性、大规模的研究讨论，他呼唤“新长江”的文化法规。尽管他当时对新长江的文化样态还没有完整清晰的构想，但是，他的敏锐和勇气，他的文化责任感，让他奋起阻止或避免“伪长江文化”，我们不得不佩服冯骥才的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关注文化的命运”，冯骥才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许多年来，冯骥才行万里路，四处奔波，用他的文化眼光看待生活，处处留心文化事项，事无巨细，倾注情怀，小到一件民间手工艺品、一条街的命名，大到城市建设、民风民俗、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所谓大师，

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之上，发现出美来。冯骥才就是这样一位大师，他能够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问题，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远见和历史意识。

三、守望民间文化

守望民间文化，是冯骥才的文化立场，也是冯骥才文化批评的最大特点。冯骥才以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现代文化眼光，站在全球化的文化视域中，坚守文化的本土立场，守望民间文化，并身体力行，知难而进，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表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为千秋万代留下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冯骥才守望民间文化，首先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在当前中国文化格局和文化建设中所处的尴尬位置和民间文化面临危机的紧迫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全球化的浪潮不断高涨，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危机日益暴露，不仅在中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

族)都深切地感到以美国为代表全球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民间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力，也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霸权，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迅速进入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强行删改中国民族和民间的“文化密码”，并以市场的形态流行，以后现代的文化手段，消解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价值取向，使我们本土文化精神日益边缘化。“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雏形依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而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谁在全球化中迷失？》)在地球文化的持续冲击下，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都在迅速瓦解和消亡，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消解过程中的民间文化。在这种情形下，守望民间文化不仅是保全本民族文化血脉和文化精神的需要，更是保持世界文化多元性、多样化的迫切需要。

冯骥才守望民间文化，并不是就民间文化来谈民间文化，而是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来思考中国的民间文化，从中外东西方文明的互融互进、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来提倡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守望民间文化，一方面要“警惕地球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消解和冲击，要保全自己的文化个性，坚持自己文化特色，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有理由抗拒文化的全球化”。在冯骥才看来，民间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是我们的文化血

型，面对全球化狂潮一般的冲击，“我们应该回到我们文化的根上，回到我们文化的根基与原点上，回到我们的母体文化中。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们鲜明的文化个性，我们的文化血型以及骄傲和自尊的依据。”（《到民间去》）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守望民间文化也不是“关起门来”，独自发展，而是要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全民间文化的经验，在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守望我们的民间文化。冯骥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为我们介绍了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成功做法，而且，从全球文化的平衡发展和东西方文明的关系角度，思考全球化语境下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多元性。这多元文化的意义在于，任何文化都有它独特的存在价值。只有自己独有的，对于对方才有价值。交流便是交换、发扬和充实这种独特性。积极地发扬自己是最好地保持自己，积极地吸收外来也是更好地保持自己。”冯骥才提出“同则不济，和则生物”的文化思想，即坚持从全球性的文化语境出发，保持文化的本土性，民族性。

到民间去！是冯骥才的文化口号，也是冯骥才把文化批评转向文化实践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冯骥才文化批评突出的实践性品格。冯骥才不仅是敏锐的文化批评家，而且是勇于实践的文化建设者，面对民间文化“正在遭受冷遇、歧视、破坏，正在濒危和消亡。我们的文化根基不但被动摇着，而且已经松动与瓦解”的局面，冯骥才向文化界发出号召：“暂时先离开我们的书

斋吧！”“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书桌应该是大地……到民间去，回到母体文化中去！”我们一起来抢救与普查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他积极奔走，多方呼吁，在经费和人员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自己筹措资金，卖掉自己多年绘画，向社会、朋友募捐，与文化界有识之士一起开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普查工程。

冯骥才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要抢救的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不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民间文化。”“它的本质是民间的，必须是民间的。”

冯骥才的信心是坚定的：“我们的口号是：一网打尽，以表示我们对先人创造的文化心怀的一种虔敬、热爱与责任。”

冯骥才的措施是得力的，他通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各省市的民协来组织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进行田野调查。要求各地在组织、队伍、人员、内容、步骤、时间、设备与经费等方面落实；同时，中国民协成立一个办公室、两个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负责该项工程。

我们欣慰地看到，经过长期

呼吁和艰苦努力，“抢救与普查”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逐渐变成了政府和文化界的一种集体行动，得到了季羡林、启功、贾芝等文化鸿儒的强力支持，更多的文化基层工作者纷纷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相信在冯骥才主持下，这项工作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我希望：文化人都能够具有冯骥才的文化精神，感受冯骥才的文化情怀，走出书斋，到民间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参与到抢救与普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中。早一天行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少受一点损失，多出一点力，就能为后人多留下一点文化财富！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



苏州桃花坞年画的代表作《一团和气》（清代）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冯骥才小说论

刘华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新时期文学的勃兴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纪元。五四启蒙意识的复兴、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张扬以及多元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不但成为众多作家创作的自觉追求，而且也成为新时期文学蓬勃生长的强劲动力。

在新时期文学涌动的第一波潮头中，冯骥才的创作以其不俗的实力和独特的个性尤为引人瞩目。他的《啊！》、《铺花的歧路》、《爱之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等作品以极左年代的劫难为背景，剖析极左政治衍生出的荒诞社会现实以及这种畸形政治带给人们深重的心灵创伤，同时以深切的人道主义情怀昭示了生存困境中人性的坚韧和伟大。这些作品成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

的经典之作，也为作者在新时期初期文坛中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真正奠定冯骥才当代文坛独特地位的作品则是他的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的市井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雕花烟斗》、《俗世奇人》等小说较早地从文化层面来切入生活，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阶段，并成为尔后文化寻根文学的先声。

冯骥才曾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新时期伊始，当许多作家纷纷从社会政治等现实层面把握现象世界时，冯骥才便已经注意到，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在个体心灵中的积淀，以及对个体性格和命运发生着深刻影响。早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的《义和拳》(与李定兴合著)和它的姐妹篇《神灯前传》便已透露出冯骥才后来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审美个性与取向，这种个性和取向呈现出地域性、历史性、民间性和传奇性等审美维度。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津门系列市井小说里，也渗透在他的众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中。

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就是社会批判交织着文化反思的力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前夕的美术学院的尖子生华夏雨正当准备“拿着画笔向生活和未来报到”时，一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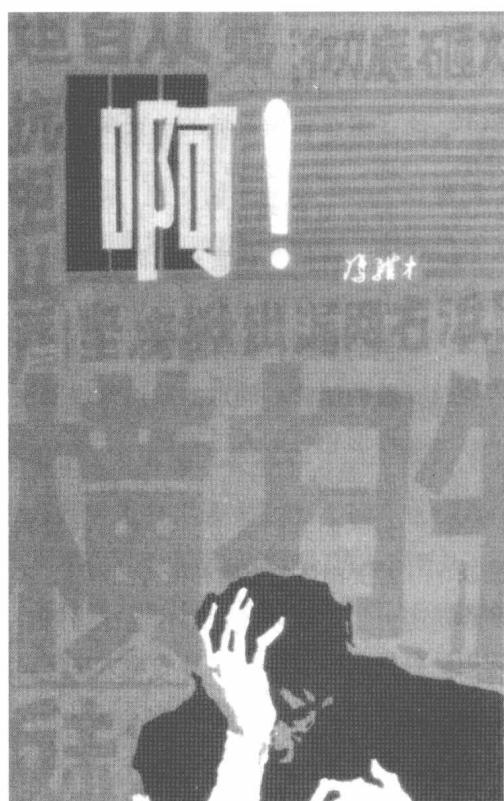
“黑色的报到通知单”如一股无名的罡风将他旋入生活的底层。他进了某个偏僻县城的一家陶瓷厂。然而，命运之神并未停止对他的拨弄。莫须有的右派身份伴随着冷眼、仇恨、陷害一起降临到他的身上。生存的困厄虽然击破了他玫瑰色的梦想，但并未毁灭他对艺术执着的信念。畸形的政治气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人性霉菌，于是，华夏雨遭遇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正直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被流放到采石场经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炼狱。

冯骥才的这部作品比当时许多伤痕小说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小说揭示了支撑华夏雨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来自于人性和艺术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根植于民族文化这块厚土。土窑里的土坯和窑工所显

示出的“单纯而辉煌、雄性加烈性”的美，不但铸造了罗长贵古朴高贵的灵魂，甚至也生成了像黑儿这样与人类相濡以沫的精灵。耐人寻味的是，华夏雨的女友杨玫玫和恋人罗俊俊分别是红色政治话语和启蒙精英话语熏陶下的佼佼者。然而，杨玫玫却因幼稚而出卖了男友，而罗俊俊终因脆弱而背叛了恋人。相比而言，华夏雨却在草根民间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由此获得了在劫难中生存和成长的文化伟力。

民族文化在民间(而非在庙堂)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形态和健康的力量，并常常给处于精神匮乏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注入生命活力。冯骥才的相当部分小说便是发掘这种民族文化的优根性。

《雕花烟斗》画家唐先生自身的命运沉浮与唐先生对老花农感情的亲疏变迁构成了某种对位关系。



《啊！》的首版封面

故事的传奇性并不能掩盖哲理的严肃性。在传统文化的生态链上，唐先生处于高端，而花农却处于底层；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上，一贵一贱，一雅一俗，似乎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唐先生艺术和人生的历程中，老花农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唐先生给予了可贵的文化反哺。如果说唐先生处于第一次人生低潮时，来自民间质朴的艺术知音使他心灵以某些慰藉的话；那么当唐先生处于第二次命运沦落时，老农散发出泥土芳香的人性之美便给了他精神以强烈的震撼。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老农以自身的生命形态诠释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圣洁和博大，使那些被虚荣、权力、利益所毒化的文化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卑琐，相形之下显得黯然失色。

对传统文化的根性的寻找和体认让作者将目光转向草根民间，投向积淀过无数历史传奇的津门地域。于是，具有底层生活经历和独特艺术感觉的冯骥才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开始和建构他的“市井世界”，描绘他的“俗世奇人”，叙述他的“怪世奇谈”。

在小说《炮打双灯》中，“卖缸鱼的牛宝”可谓津门环境里生长的典型市井小人物。从故事表层看，牛宝是阴差阳错地卷入了蔡杨两家为争卖鞭炮地盘而相互角力的余波中。牛宝明知前景险恶却仍不放弃争胜逞强，甚至付出炸废一只手的代价，为的只是取悦自己心爱的女人。人物的这种行事方

式明显地带有某种市井气和江湖气。然而，牛宝对爱情的追求和对技艺的追求一样，都看作是一种生命意志的实现，并且将其推向极致，抵达辉煌。当年的一个小人物的经历成了今天街头巷尾的传奇，这表明“炮打双灯”的民间技艺连同涌动着自由生命热力和美感的民族文化，到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绝响，需要人们重新发掘、激活和复兴这种文化的美感和力量。

冯骥才的总题为“俗世奇人”的系列小品式短篇里，传统文化在草根民间体现出来的魅力可谓是异彩纷呈、叹为观止，而这种文化凝结在众多性格中的人格魅力同样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如《苏七块》中苏金伞“格色的规矩”中深藏着世俗中生存的智慧和悬壶济世的仁心；《认牙》中的华大夫“医术顶天”的背后是专心致志的专业精神和平等正直的处事态度；《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鳌》中的小杨月楼与李金鳌义结金兰，则刻画了身处乱世之中的普通人在相濡以沫、共渡难关中所表现出来的侠肝义胆与古道热肠。所有这些都表明，传统文化的最有生命力的根系深深广布在民间，它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积淀，同时也铸造了民族集体人格中的脊梁部分，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仍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二

冯骥才把他的小说定义为“文化反思小说”。这在新时期初期的反思文学中可谓品格独具。当时多数反思文学都集中在政治或人性的层面上对现实进行理性的追问和反思，这种追问和反思的参照坐标

便是五四的启蒙话语，或从“民主/专制”的对立中反思极左路线的政治伦理基础，或从“人道/野蛮”的对立中反思极左时期人性普遍异化的道德生态环境。然而，冯骥才在面对现实的痼疾却敏感地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历史根性对现实产生的隐性而强大的支配作用。

既然现实的人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体，而人的现实又是从文化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存在物，那么对现实的反思必然要深入到对文化的反思。对于这一点，冯骥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说明他“为什么对反思文化小说有兴趣”这一问题时，他解释道，“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长期的封建主义的控制之下，它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有很强的整体性、系统性，也有博大恢弘的包容性，因此，中国文化就构成了一个自我体系。”^[1]这里，作者意识到文化所具有的优根与劣根的杂糅特性，以及作为自成体系的巨大制约功能。

在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和“怪世奇谈”等系列小说里，从光怪陆离的世象人心里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劣根性的一面。如《背头杨》里，杨大小姐“铰了头发，仿照维新的男人们留个背头”的作派，固然反映了某些青年对当时的维新变法的幼稚和肤浅的理解，然而，杨大小姐“不过留一个背头，连厕所也进不得”的尴尬遭遇，也折射出国民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态。《死鸟》里那个贺道台所得的“死鸟”外号的经历，近乎一则荒诞的笑话：贺道台开始想借鹦鹉邀宠献媚上司，最终鹦鹉不合时宜的一句学舌却让他惶恐窘迫，几罹大祸，令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小公

务员形象。但透过荒诞不经的故事表层，作品不但揭露了官场的专制腐朽与等级森严，而且也揭示了封建专制文化束缚下国民卑琐苟安、言不由衷的奴性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既奔涌着清洁健康的活水，也掺杂着污浊腐朽的死水，后者很大程度上是上层封建专制文化的长期排污毒化的结果，并由此在广大民众中逐渐积淀成似乎可以世袭相传的陈规陋习和与之相应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产生着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叙述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动荡岁月中的悲惨经历和他们感人的爱情。高女人和矮丈夫在文革年代所受的磨难小说作了后台处理，凸现在前景的是打量这对夫妇的众多目光中所透露出来的小市民文化心理。作家捕捉到一对“身高逆差一头”的夫妇，从他们所遭受到的冷眼和中伤中，揭示世俗心理中卑微、污浊的一面。那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光，那落井下石的市侩行径，那窥人隐私的奇异癖好，那搬弄是非的旺盛精力，充分表现了小市民文化心理中的污垢。这种市侩心理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垃圾，也有极左政治的社会遗毒。从这种市侩心理的形成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缺失的正是封建专制文化中所阉割掉的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个性。

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犀利解剖和猛烈抨击的小说还是他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然而，这部作品在80年代发表时曾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有人竟认为作者是在宣扬和赞美“三寸金莲”)。之所以产生误读，很大程度上论者未能理解小说的反讽手法，更无从体察这种手法背后

所隐含的文化批判立场。

其实在《三寸金莲》的“书前闲话”里便开宗明义地点出“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样的警句。显然作者是将“三寸金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观照民族历史的一帧面影，审视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文化就其实质不过是“使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2]人类有一种符号化的能力，这是我们文化生存的基石；反过来，这种符号一经形成，则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产生重大的制约力和深刻的影响力。

在小说中，主人公戈香莲与缠足之间关系是贯穿戈香莲一生的中心事件，而作为生活在某种文化制约下的人(戈香莲)和这种文化的经典化符号(缠足)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更是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的。在小说中，戈香莲对缠足的态度经历了从“痛苦、抵制”(小闺女香莲裹足后，两只脚烂成丑八怪。奶奶一脸恶相，香莲只得依了。)到“认同、自恋”(灯节这天，佟家又赛脚，香莲使出小脚功夫，让客人惊叹不已。)再到“困惑、挣扎”(天足会与复缠会一决高低，可这次缠足会兵败如山倒。而对阵的牛俊英竟是戈香莲丢失的女儿莲心。)三部曲；而社会审美心理对缠足的态度也经历了从非常态到常态再到非常态的曲折过程。这种社会审美心理其实是由男性的眼光主导的。

戈香莲成功地被接受缠足——不仅从肉体上也从意识里——既得益于权力的惩罚(如戈老婆子的恶相和大少爷的狠揍)更得益于权力的规训(最典型的是频繁举行赛脚会和组织看客对小脚进行评点嘉奖)。后者约束个体的纪律“被仪式化”^[3]从而达到“权力的化境”——“权力的

自动运作”。¹⁴果然，被驯顺的戈香莲后来在听到放足的宣传后非常生气，连忙叫家里人赶做绣花鞋，而自己却自告奋勇当“保莲女士”。这表明传统文化符号借助其权力的特殊运作方式成功地使个体意识格式化。

三

冯骥才对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的批判是深刻、精警和有力的。存在在历史习俗中的“三寸金莲”经作家的理性审视便上升为一个“带血的记号”，一个“能裹手、裹眼睛、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的巨大文化符号。这种对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强大的制约效应的巨大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超常态存在的重要基石。对于这一点冯骥才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在文化上进行文化反思，他是在一种自大、自傲和糊里糊涂的情况下过来的，对自己的文化不是很清醒”。¹⁵像《三寸金莲》中，把满足男性病态情欲而戕害女性身心健康的“缠足”作为一种

“美”加以玩赏，便是一种畸形文化心理，其所暴露的是民族文化价值系统中人的价值的丧失与生命活力的萎缩。

对这些基石的撼动便是一个文化反思的行为，这需要反思者具备一个文化“他者”的审视眼光，一种既能够审视传统文化缺失，又能够明辨传统文化精髓的历史精神和现代意识。否则，这种文化的反思便会陷入文化宿命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

在他的中篇小说《神鞭》里，作者从历史记忆中发现了另一个与“三寸金莲”相映成趣的巨型文化符号——“神鞭”。与他的其他文

化反思小说相比，这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具有综合、辩证的特点，有着更为深邃的文化审察力度。

如果从故事层面上看，这部小说似乎更像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很多流行要素它都具备。比如，除暴安良和爱国主义的主题框架(傻二教训街头地痞以及与洋人的对决)、武侠传奇式的情节主线(神鞭与江湖上各类身怀异术的各类人物带有传奇色彩的周旋和较量)、清明上河图式的地域背景(三教九流的生活方式与光怪陆离的民间民俗作者相当谙熟)以及评书说唱式的口语风格(这种盛行与传统民间的叙述体式最富民族性和大众性)。

然而，这种大俗的叙事形式并没有排斥大雅的主题内涵。在小说里，“神鞭”既是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道具，更是承载作者文化反思的主题意象。津门皇会上傻二“大辫子”在地痞玻璃花面前的初次亮相，如横空出世，初步展露了“神鞭”的威力；接着拥有弹弓绝技的地头蛇戴奎和盛气凌人的祖师爷索天响也都纷纷在“神鞭”面前败下阵来，从此“神鞭”的美名远播遐迩。之后，无论是本土流氓的暗算还是东洋武士的挑衅，傻二的“神鞭”历险不败、神威依旧。于是，“神鞭”开始了无往不胜的神话，成了众人膜拜的

Feng Jicai

Ach!

Ein Kurzroman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tragen
von Dorothea Wippermann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Helmut Martin



为德文版《啊！》自绘的主人公吴仲义的形象

图腾。

手执大刀、口念咒语的义和拳在西洋人枪林弹雨下的冲锋，让“神鞭”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神鞭”烧焦了，裤子尿湿了。从此，“神鞭”风光不再，虽然在秘方的帮助下，“一条光滑乌亮、又粗又长的神鞭完全复原了”，但面对玻璃花的“洋枪子”再也无法抖擞往日的神威。于是，傻二带着他的“神鞭”遁迹了。冬去春来，“神鞭”仿佛经过了凤凰涅槃，以另一种形态获得了新生：“鞭”剪了，“神”却留着。“神鞭”摇身一变成了“神枪手”，百步穿杨，弹无虚发，“就像他当年甩出神鞭抽人一样纯熟快捷，神鬼莫测。”

“鞭”剪了。虽然神鞭绝技是祖上传下来的，在对付内忧和外患

时也曾上演过辉煌，但是祖宗的的规矩还是渐渐成为抱残守旧、窒息生机的桎梏，并且在新一轮对域外对手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这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上所遭遇到的命运的绝妙写照。对于传统文化中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部分要坚决舍弃(正如傻二所说“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即使这种妨碍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古董体面地苟延残喘也不行(尽管神鞭在秘方的调养下完全复原了，但傻二还是义无反顾地剪掉了)。

“神”却留着。傻二自从继承了祖上留下的“神鞭”以来，一直在领悟“神鞭”的“神韵”。除了除暴安良的正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外，“神鞭”的“神”应该就是“创新”和“变革”。傻二之所以能把“神鞭”的“神威”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不墨守成规，敢于冲破祖宗的禁令。比如，傻二违背了父亲“千万别露出它来”以免“招灾惹祸”的遗训，在津门皇会上惩凶除恶，恢复了“神鞭”匡扶正义的入世精神；再比如，傻二违背了还打破了祖宗立下的“传子传孙，不传外人”的禁律，在义和

拳失败后开馆授徒，让神鞭由保佑一己之利的“私藏”推广为兼济天下苍生的“公器”；最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举动还是把祖宗的宝贝剪掉了。这一石破天惊之举，意味着傻二的思想已从对神鞭的“改良”上升到对“神鞭”的革命。这种转变是基于经受了失败痛苦的傻二参悟到的“神鞭”真正的“神韵”：“你要知道我家祖宗怎么创出这辫子功，就知道我把祖宗的真能耐接过来了。”创新、变革，才是“神鞭”的出路，才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走向新生、走向复兴的唯一真谛。“神鞭”转化为“神枪手”，意味着与小农意识的保守性和封建宗法的狭隘性告别，意味着传统文化智慧的旧枝嫁接上了现代文明先进的新树。看来傻二不傻。借小说中人物之言和人物之行，作者道出对传统文化反思的理性思考。

冯骥才小说中的“文化反思”是对“现实反思”的深化和超越。这种“深化和超越”之所以在同时代作品中仍能技胜一筹，是由于作者对传统文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就是作者本人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从他对古典绘画的造诣与传统古迹的珍视便可见一般)，这使得他的小说既能描绘出传统文化诸相的神韵，又赋予传统文化体现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场景中丰富驳杂的质感，再加上继承了传统民间的典型叙事体式与洋溢着地域风情的津味语言，冯骥才的这类作品极富民族性、本土化和通俗化的文学形态。

“出乎其外”便是作者能够与表现对象拉开时空及价值取向的距离，站在一个文化“他者”或“异质者”的立场上，即用现代意识对已经消逝然而至今仍发生着影响的传统文化进行冷峻的审视与反思；同时这种理性的反思也悄悄改变着小说的叙事方式：幽默与反讽、白描与象征，传统叙事范式与现代叙事手法在小说中交相辉映、并行不悖。

无疑，冯骥才小说中的文化反思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同时又是富于艺术创造性和感染力的。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

注释：

[1][5]冯骥才，转引自鲍越、裴明海著《诠释大冯——冯骥才述评》，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2](英)雷蒙德·威廉斯，转引自(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4](法)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

题记“我天生为思想和精神而活”

江胜信

认识冯骥才有5年了。他是个有悲壮情怀的人，他自己也说：“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我天生是为思想和精神而活着的。”对这句话，我最初不甚明了。这个被周围人称作“大冯”的人，忧郁而深邃的眼神叫我无法解读：他为什么非得把书桌搬到田野里，十多年如一日，置身于民间文化保护的战役？当然，他并不是一直忧郁的——每当挽救一片街区、一幢古建筑，每当寻访到一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每当记录下濒临遗散的口头记忆，也会眉开眼笑。但笑意只是一瞬，而后转身，留给我们的依旧是那个背影：他在风车前执起长矛，朝夕舞动，四季无休，即使是一米九二的魁梧体魄也显得身单力薄。这两年，我跟他日益熟络，越来越不愿意放过他的每一次行踪以及每一部在田间挥就的作品。就在5月初他访问韩国期间，我们也每天通过短信进行交流，但震撼却不减当年：到底是何种质地的心胸，可以盛下那

么多的远见、深忧、执着、坚韧、豪情和雅致？他到底走到了什么样的疆界，见识过什么样的美，那些美又是如何陨落幻灭，以致这个做出那么多努力的男人，反而默默自责，怪罪自己的束手无策？既然我无法用一个版面的篇幅绘制出他从专业篮球运动员、画家、作家到文化保护者的种种精彩，那就说说这些年追踪到的他的一举一动吧，这难道不同样精彩吗？

三个电话速写大冯

安徽省石台县一幢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古茶馆，6月底被曝光即将装箱卖至瑞典；一月未满，局势陡转：原本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茶馆，一路绿灯特事特办，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逃脱了“远嫁”异国的命运。当这一喜讯见诸媒体之时，我却透过行文，看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故事里浸润的别样的辛酸和欣慰。而这一切，与大冯的努力息息相关。只要

撷取他与我之间的“三个电话”，以此作为速写用的炭笔，就能刻画出他的真性情和不变的理想——

6月29日上午11时“我们竟这样自戕徽州文化！”

手机铃声响起，屏幕上显示的是“冯骥才”。我刚摁下接听键，“冯老师”三个字还没叫利索，那头就激动地问：“小江，你知不知道，皖南古徽道旁一处有200多年历史的茶馆快要被整体搬到瑞典去了？”

“是吗？这好啊！”可也就一秒钟的功夫，我回过神来了，补充道：“这件事情本身不好，但值得说一说，所以我就说好了。”

这显然已铸成小错，那头哭笑不得：“我本来就已经很生气了，你还说好？气死了！我被你气死了！”

“这不，我赶紧改口还是被您揪住小辫子了。”

他应付着一乐，随后就气咻咻地嚷嚷开了：“居然仅仅凭借地方

的一个手续，就把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贩卖掉了。还拿出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它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可它难道不是我们共有的遗产吗？谁给他们这个权利了！为了金钱，我们竟这样挥霍、糟蹋、自戕我们的徽州文化！”

他的声音异常激越，仿佛要刺破耳膜，即使将手机稍稍放远，字字句句也同样掷地有声。这股讨檄将我的情绪迅速点燃，5分钟后，待他话音刚落，我说：“我想立即去一趟天津会会您。”

“我知道你一向很积极。我下午会给你打电话定见面时间。来之前，你先上网查询关于‘老茶馆’远嫁‘瑞典’的资料。”随后他火急火燎挂了电话。

我坐在电脑前，按他的要求查询资料。事情源于今年6月初，瑞典一位仿古商船的商务经理来到安徽石台县考察，对古老的徽州文化、茶文化赞不绝口，并萌发奇想，计划将古徽道旁一处有200多年历史的徽州老茶馆整体搬迁到瑞典哥德堡市。石台县有关部门称这幢古建筑不属于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同意将它“远嫁”。目前，古茶馆的拆卸工作已在准备之中……

这一做法引发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认为这是严重破坏文物的短视做法，徽州老茶馆所散发的地方文化魅力只可能属于中国，属于徽州，一旦搬到瑞典，只能成为一件奇异的舶来品；赞成者认为这不仅提升了当地知名度，宣传了本土文化，也可看作是文物“异地保护”的又一尝试。

但随着我的进一步查询，我的心隐隐有些发凉。这居然是有先例的！此前，皖南休宁县黄村的古民

居“荫余堂”经过7年多的策划、施工，于2003年搬迁至美国的埃塞克斯博物馆内。当“荫余堂”在国外大放异彩时，国内却准备用上千万元在原址上重建一座“荫余堂”。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叹不已。3年后的今天，历史却再度重演，钻的竟然还是文物保护法规的同一漏洞！

任何人都不难预见，接下来应该就是梁柱牌匾被装入集装箱漂泊出海的镜头。我不禁有点悲戚，想起大冯在所著《民间灵气》中说到曾为挽救海河两岸历史遗存而游说，以至口干舌燥，但面对的依旧是直怔怔的眼神。

然而，大冯对这样的先例肯定是不管不顾的。他那激愤的声音，这会儿说不定又响在另一个人的手机里，而这个人一定是大冯认为可以帮他一同呼吁的。

6月29日下午5时“我的心电图出了点问题”

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大冯的电话，有点心焦。

终于，电话盼来了，我的嘴角刚因喜悦弯出一道弧度，就马上僵住，因为分明听到大冯在说：“本打算明天让你来天津的，现在看来不行了。体检结果刚刚出来，我的心电图出了点问题。”这一音调，比起上午低了很多分贝。

“怎么会？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倒没有，但

觉得很累。”

“以前体检有迹象吗？”

“过去一直正常。这次颈椎出了点问题，因此在做心电图检查时不能躺着，只能坐着。心电图异常或许是这个原因吧。”

“医生怎么说？”

“建议我再到几个大医院做一下复查，听听专家的意见，我明天就准备干这事。大伙都关照我平时一定要多休息。”

但他停得下来么？自打1994年为保护天津老城奔走呼吁开始，大冯一直在为文化保护事业透支自己的体力。以至于6月21日那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民间剪纸集成》示范本‘蔚县卷’首发仪式”时，有一个记者同行指着主席台上的大冯悄声问我：“你不觉得冯骥才这些年苍老了很多吗？”我这才惊觉，比起5年前初识时的样子，他的眼角和眼袋真是耷拉得厉害。而最近这阵子尤其多灾多难：先是颈



大冯编写的民间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椎不适；然后是手被扎伤，无法在电脑前工作；现在，心电图又不正常。这不禁让我心生感慨，这个一度自我评价“非常强壮”的男人，除了身高，恐怕再难让人联想到他当年是何等出色的篮球运动员，身手矫健，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篮。

我只能安慰他：“您太着急了，太容易激动了——就像上午，您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生疼。”

他呵呵地乐开了。我继续说：“您以后放宽心，让我们帮您呐喊吧。您该去画画，有好长时间没有画画了吧？”

“有段时间没动画笔了，是该画画了。”随后是一段沉默。或许我们都心知肚明，这只是很难实践的美好愿望。一如对待他爱极了的写作，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一直把他折磨得很难受，但无法找到时间宣泄至笔端。他曾经自问：“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选择什么？我是不是此生注定要守候在民间了？”他在所著的《思想者独行》中，似乎作了回答：“不管是风风火火抢救一片在推土机前颤抖着的

历史街区，还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处寻觅历史文明的活化石，惟有此时，可以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又如他在《民间灵气》中所说：“我不能在稿纸上停留太久。我必须返回到田野里，因为我要做的事远远比我重要。”

7月20日上午11时“古茶馆在半路被截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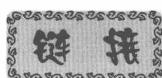
白纸黑字的契约，让徽州古茶馆“远嫁”瑞典的命运似成定局；而节骨眼上，试图力挽狂澜的大冯又因心电图异常不免神伤。那天过后的第一个周末，他开始去天津的一些大医院复查。我心存挂念，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过去询问近况。令人欣慰的是，他并无大恙，但必须听从医生的建议，不能再过度操劳。

近一个月来，我又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两个活动，果然未见大冯的身影。按过去常情，他一般会在类似的场合现身，而我也总是一半公事、一半私交的去捧场。但自从得知他心电图不太正常以后，我倒宁愿他在家调养。他是该好好歇一歇。

7月20日上午11时，我又拨通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平静中透着喜悦和骄傲：“小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徽州古茶馆在半路上被截了回来。”这样的转机令我惊讶不已。

原来，即使身体不适或疲倦，大冯依旧在牵记着这座古茶馆。他不仅找媒体的朋友一同呼吁，同时还打电话到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力陈利弊：“虽然有先例，但如果我不赶紧刹车，还会有很多古民居被仿效出卖，我们最终会被历史判定为罪人！”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按原计划，古茶馆将在今年8月被卖到瑞典，缘于大冯的呼吁，政府有关部门特事特办，对古茶馆的文物价值进行鉴定，这一古建筑被认定为文物，逃脱了被卖到海外的命运。

“你们都在帮我。”大冯颇有一种遇知音的欣慰，“文化部的朋友知道我心脏不好，反复关照我别着急，事情由他们帮着办。”这时候，我找到了他永不放弃的另一条理由：他并不孤单，总有些志同道合者，伴他左右。



老津城：自费考察救古迹

我沾过大冯一次光，“省”了一次打车费。

那是前年春节过后，我去天津参加他的一个活动。一位天津“的哥”非得免去我的车资，若要强给，还跟我急：“你只要帮我传一句话就行：谢谢他赞成大家放鞭炮，天津的年味儿才这样浓！”

天津的老百姓感谢他，远非仅此！当他们骄傲得谈起在推土机面前幸存下来的老城区时，大冯更被套上了英雄的光环。

1994年，大冯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铲除

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这意味着拥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天津城、义和团重要的塘口、五四运动的遗址，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了。大冯急了，“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拿出一笔稿费来，请了七八十个人，有历史学家，有建筑师，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然后全部都拍下来。那次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片子，然后，择出2000张印成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到各局局长，每个人送一本。最终，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